

兩個革命的對話： 1789 & 1911 (下)

• 孫隆基

五 李大釗的一篇「反革命黑文」

在「二次革命」期間，耐人尋味的是「中國馬克思主義之父」李大釗之持反對立場。在這裏，我們必須拋棄黨營史學的框框，把李放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裏。李在清末考入袁世凱嫡系的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，此乃訓練未來官僚的場所。既然關係到飯碗，李於1913年任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期間，即為文替「官僚主義」恢復名譽，認為「一般人」非難官僚主義之「心理」不當，蓋「即美以平民政治號於世界，近亦悟官由民選之害，而亦急急於規定任官制度，則侈談民政而斥官僚主義者，亦可以醒然悟矣！」^③同年冬，李畢業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，獲進步黨黨魁湯化龍資助，赴日本留學^④。

顯然，李大釗與進步黨關係密切。他當時發表一系列文章，步調也和梁啟超合拍。刺宋案後國民黨還未起事期間，梁於4月1日發表〈暗殺之罪惡〉一文，譴責暗殺之風。李則於5月1日發表立場相類的〈暗殺與群德〉一文，於9月1日又繼之以〈原殺(暗殺與自殺)〉一文。梁於1913年1月1日刺宋案未發生前曾著有〈政治上之對抗力〉一文，提倡培養反對黨政治；李於東渡日本後，亦於1914年11月1日發表〈政治對抗力之養成〉一文。此外，在梁啟超的《庸言》上以「胡以魯」之名發表的〈原亂(民族心理觀)〉(1914年5月5日)，也可能為李大釗所著^⑤。

李之政治立場基本上與梁同，既譴責刺宋案，又不贊成國民黨在南方起事製造國家的分裂。李雖譴責暗殺，卻避重就輕，不觸及袁世凱，反而用社會心理學，說宋教仁「死於群德之衰」^⑥。蓋「人類富於模仿，……乃社會力之一種。今人輕身好殺，相習成風，自清季已然。……光復以還〔指民國成立〕，人心世道，江河日下」，但如「以暴力止暴力」，則只有「貽害靡窮」^⑦。

李大釗雖譴責刺宋案，但卻避重就輕，不觸及袁世凱，反而用社會心理學，說宋教仁「死於群德之衰」。

李大釗東渡日本後，於1914年發起組織神州學會，開始進行倒袁運動。他繼續運用社會心理學分析，但其實用法國大革命搞影射史學³³：

風俗之行，一緣暗示，一緣模仿，……有如何之人群，斯產生如何之人物，有如何之人物，更造如何之人群。必有法之人群，始產拿破崙，亦自有拿破崙之人物，而後法之人群至今猶尚權詐。必有美之人群，始產華盛頓，亦自有華盛頓之人物，而後美之人群至今猶重道義。

但李之反袁並非等於支持國民黨，而可能與進步黨路線轉變有關。他仍以國民黨討袁為「以暴易暴」，論證「依暴力不能得平和之理」：「蓋政權之起伏於暴力間者，恆奔馳於極端之域。彼以力據，此以力攻，力之所衝，反動必起。……如此輾轉，互應不已。」如果袁世凱是拿破崙，則國民黨在李大釗心目中乃恐怖時代的山岳黨：

法人之揭三色旗謀建共和也，固以民眾幸福為職志。而政力相軋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遂至山岳之黨，無袴之氓〔筆者按：Sans-culottes〕，橫握政權，殘殺異己，不遺噍類，卒演成千古寒心之恐怖時代。而羅卜士比爾等借口共和，勵行專政，設革命審院〔筆者按：revolutionary tribunals〕，誅非革命黨員，王侯士女，中流士紳，慘被刑戮。創掩擊（集眾人於一處，發炮擊之，謂之Husillades）、溺舟（載眾人於一舟溺之，謂之Noyades）之極刑，用機螺金〔筆者按：guillotine〕（刑具也，英、法、德諸國，素用以殺人，1791年醫者機螺金改良之，勸立法會議採用，故有是名）之毒器，民眾驚怖，亡竄流離，閭閻無雞犬之聲，婦孺罹盡沙之劫，毀及於陵寢，禁施於宗教，舊時典制，鮮有存者。無何，暑月變起〔筆者按：the Thermidorian Reaction，今通譯作「熱月政變」〕，首雲誅夷，政力漸趨平和，法民獲以少安。而拿破崙之帝制自雄，或即兆端於暴民橫行之際，於斯時也，法人所事之共和幸福，果安有也。

孫中山之成為辛亥革命正統甚至「國父」，乃1927年以後國共兩黨營建的正統史觀之產品。其實在辛亥前後，孫中山、黃興派的群眾基礎都不廣，也不具全國級領袖的分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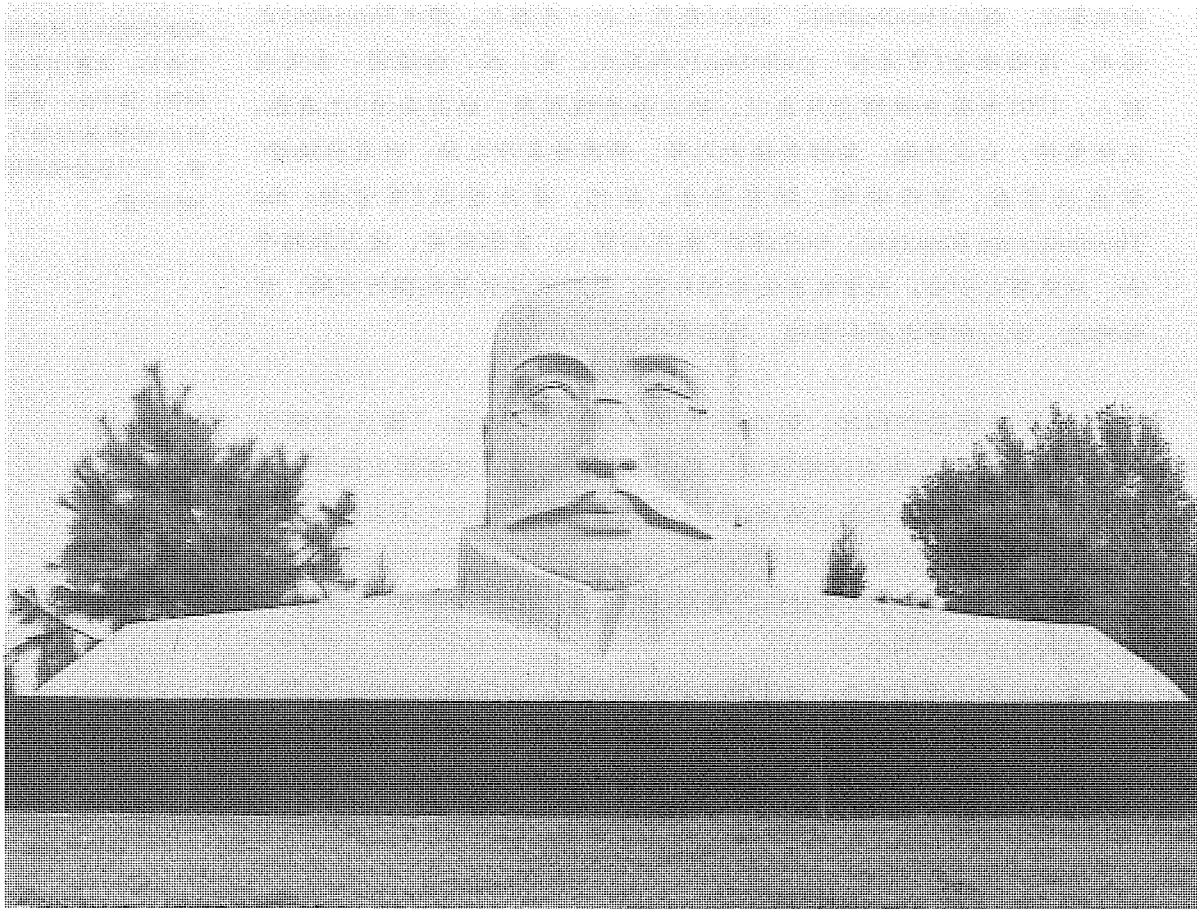
李接着針砭始於1910年，猶在進行中的葡萄牙革命：「葡人今猶不悟，……徒演法蘭西之慘史以震駭世人而外，他無所得。」這表面上與袁政府視墨西哥、葡萄牙革命為暴亂之論調相同，但袁之目的在樹立一個皇帝，李作出同樣指責，則正因為這種暴亂只有替拿破崙式專制鋪路。李引用托爾斯泰的「歷史上人物之勢力，莫非群眾意志之累積」之命題，斷定「拿破崙」之成敗「與奪之權，實操於群眾之手也」³⁴。

李大釗既反對山岳黨橫暴，亦不贊許拿破崙稱帝，乃呂邦式成語。呂邦左右開弓，把這兩種現象當做拉丁民族劣根性的兩個面相。李對「恐怖時代」的描寫，也像呂邦在《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》一書裏的描寫。該書於1914年翻譯成日文（名《革命の心理》）³⁵。該時李大釗已經抵達日本。在包括上引文的那篇文章裏，李大釗確實提到「法儒社會學者魯彭氏，名今世曰「群眾時代」」。這個名詞乃呂邦《群眾心理》一書的導言之標題，而該書亦於同年翻譯成日文（名《群集

心理》)。其時日本正從明治式寡頭政治過渡到大正時代的議會內閣政治，因此「群眾時代」一詞或許變成時髦口頭禪也說不定。

李大釗是否「反革命」？我們該歷史性地看問題。孫中山之成為辛亥革命正統甚至「國父」，乃1927年以後國共兩黨營建的正統史觀之產品。在辛亥前後，孫中山、黃興派的群眾基礎都不廣，也不具全國級領袖的分量。武昌起義並非同盟會所組織，事發後，孫閱美國報紙才獲悉。清廷之垮台，由於南方各省諮議局的立憲派倒戈——這些人思想上乃梁啟超一路，皆非信念上的共和派，實有感於清廷無可救藥。因此，辛亥革命不是革命黨奪取政權，而是南方各省紛紛對北京宣布「獨立」。袁世凱當了總統，自然就是合法的「中央」，即使不為個人野心，為了建國，也無容忍南北長期分裂之理。至於孫、黃的「二次革命」，則有地方派系另立中央、分裂國家的嫌疑，因此缺乏大眾支持，只有三省響應，旋即被撲滅。袁政權後來失去合法性，乃由於想在恢復帝制基礎上完成國家統一。袁的倒台，導火線是梁啟超與蔡鐸之合謀，反映的則是更廣大的中間分子之離心。在此意義下，當時的國民黨確實有點像「唯我獨革」的山岳黨，而也是共和派的梁啟超、李大釗、蔡鐸等人則拒絕在「民國」與「國民黨」之間劃上全等號，似乎可比作紀朗德黨。

李大釗與袁世凱頗有淵源，但他東渡日本後，便立即對袁之稱帝野心大加譏伐。



六 以法為師的中國啟蒙運動

當時的「過激」思想也非國民黨專利，還包括正在興起中的新文化運動。後者偏重思想啟蒙，與民國的骯髒政治(包括國民黨在內)保持距離。少年中國學會的常乃惠寄信給《新青年》主編陳獨秀，指責「今所謂共和民政之亂者」，其一「蒙共和之名，行專制之實，如近世民賊大盜之所為」，其二則「樹黨以互攻，或恣戮以快意，馴至如法國大革命後之恐怖時代，人人自危，有朝不保夕之虞」。把北洋政府和在南方另立中央的孫派各打五十大板④。

陳獨秀則與各政治派別都保持等距離，他說：「同一北洋系，而馮(國璋)段(祺瑞)又未必相同，同一民黨，而孫(中山)岑(春煊)素不相得，同一護國軍，而滇粵勢不相下。」但心底裏可能對革命派比較愛之深責之切，因此嘆息他們之徒勞無功：「莽哉吾國民黨人，既無法使國人信仰共和之度量日益增加，又無法使國中反對共和之蠱蟲日益減少」，蓋「歐美文明制度」不能「強使盡行於至野蠻不識字無經濟能力之豚尾民族」⑤。陳的論調基本上仍是共和政體不合國情，和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(A.J. Goodnow)同調，但陳的答案不是帝制復辟，而是徹底改造國民性的啟蒙運動。

新文化的啟蒙者自然也是共和派，甚至可以算激進共和派，但他們認為共和國該有共和國的國民心理才能落實。陳獨秀的同志高一涵說：「政治實質之變更，在國民多數心理所趨，不在政治之形式。」⑥既然「國家之設，乃心理之結影而非物理之構形」⑦，因此，徒具共和國形式而無其國民心理內容者，不成其為共和國。高一涵歌頌法國人用革命之「心」締造共和國之「實」⑧：

彼法蘭西自革命以後，制度破壞，秩序蕩然，迨入於恐怖時代(Reign of Terror)，激烈黨之互遭殘戮者，不下百萬。外國列國王侯，……合兵攻法，四境敵兵，長驅深入，……國勢之不絕者直如縷耳。然法人求共和之心，謀自由之志，未嘗因是而止也。其後拿破崙以一世之雄，窮狗法人，……共和既翻，帝政旋始，生殺予奪，從其一心。然法人求共和之心，謀自由之志，未嘗因是而止也。……故能成此掀天撼地之殊勳，為民族而戰，為國家而戰，為世界之人道而戰，而無所恐怖也，……。

這種用革命意志來締造共和國之論調，其激進也與革命派同，不同之處在啟蒙者非黨工幹部，不直接從事組織群眾的工作，而既云「啟蒙」，亦勢不免設定群眾之落後性。高一涵說：中國人共和國意識不發達，乃在於「群眾心理……受專制之毒彌深，……群眾之心靈汨沒，而進化之機息矣」⑨。陳獨秀則認為⑩：

抵抗力薄弱之民，雖堯舜之君，將化為桀紂，抵抗力強毅之民族，雖路易[路易十四]拿翁[拿破崙]之梟傑，亦不得不勉為華盛頓，否則身戮為天下笑矣。自社會言之，群眾意識，每喜從同惡德汙流，情力甚大，往往滔天

陳獨秀認為共和政體不合國情，這跟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同調，但陳的答案不是帝制復辟，而是徹底改造國民性的啟蒙運動。

罪惡，視為其群德之精華。非有先覺哲人，力抗群言，獨標異見，則社會莫由進化。

於是他以啟蒙者身分，針砭「今日卑劣無恥退蕙、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」^{④7}。陳又說張勳、康有為等人之搞復辟十分符合「孔教國國民之心理」^{④8}。這幾乎像李大釗把宋教仁之死歸咎於「群德」而非原兇罪首之袁氏。

袁世凱死於1916年6月，張勳的清室復辟則發生在1917年6月。其間陳獨秀寫了〈袁世凱復活〉一文^{④9}：

那破嵩一世破壞法蘭西共和，帝制自為，身敗名裂，其猶子那破嵩三世，仍明目張膽，蹈其覆轍。今墮地呱呱之中華民國，在朝之魔王袁世凱一世方死未死，而在野之謬儒袁世凱二世方生，一何中外古今之史例巧合若期也？……其利用國民弱點，投合舊社會之心理，增上其種種罪惡，以自擡權勢也同。

陳獨秀在《青年雜誌》創刊號發表的〈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〉一文，寫作於十月革命前兩年，因此他心目中的「社會主義」還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，其故鄉亦不可能是俄國，而是法蘭西。

1921年，少年中國學會的李璜也說：「唉！共和已經十年，中華民國的國民有幾個知道〈人權宣言〉上說的甚麼東西，有幾個感着人權的必要！」他感嘆「法蘭西三次革命以後」才「再不出皇帝」^{⑤0}。

陳獨秀之啟蒙方案，就是找最激進的共和國文化注入中國人心理。他在《青年雜誌》創刊號上即發表〈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〉一文，具開宗明義作用^{⑤1}：

近代文明之特徵，最足以變古之道，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，厥有三事：一曰人權說，一曰生物進化論，一曰社會主義是也。法蘭西革命以前，歐洲之國家與社會，無不建設於君主與貴族特權之上，自千七百八十九年，法蘭西……之〈人權宣言〉(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'homme)刊布中外，……曉然於人權之可貴，群起而抗其君主，撲其貴族，列國憲章，賴以成立。……人類之得以為人，不至永淪奴籍者，非法蘭西人之賜而誰耶？

步隨歐洲啟蒙運動後塵，陳獨秀也要打倒宗教權威：「其迷信神權，蔽塞人智，……生物進化之說，謂人類非由神造，……然追本溯源，達爾文生物進化之說，實本諸法蘭西人拉馬克(Lamarck)。……法蘭西人之有功於人類也若此。」陳寫作於十月革命前兩年，因此他心目中的「社會主義」還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，而其故鄉亦自然不可能是俄國，而又是

其說始於法蘭西革命時，有巴布夫(Babeuf)者，主張廢棄所有權，行財產共有制，……十九世紀之初，此主義復盛興於法蘭西。……其後數十年，德意志之拉薩爾(Lassalle)及馬克斯(Karl Marx)承法人之師說，發揮而廣大之。……繼此以往，貧民生計，或以昭蘇。此人類之幸福，受賜於法蘭西人者又其一也。

他下結論說：「世界而無法蘭西，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？」^⑤因此，連《青年雜誌》的西文名字也用法語：*La Jeunesse*。

再過幾年，陳心目中最激進的共和國文化就會變成蘇聯。但陳在以法為師階段時，其啟蒙方案內含有他本人不覺察的矛盾。十九世紀末生物進化論應用在社會科學裏，就產生呂邦的社會心理學。呂邦不只反對社會主義，還歸咎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頭上。他批判啟蒙思想家「對人之原始期歷史、心理差異和遺傳法則都十分無知，才會提出所有個人和種族都平等之〔謬〕說」^⑥——換而言之，受啟蒙思想塑造的革命文獻〈人權宣言〉乃形而上學夢囈。

七 「群眾心理」與「暴民政治」

呂邦的國民心理學流行始於清末，他的群眾心理學則有後來居上之勢。1907年，梁啟超謀用「提倡開國會，以簡單直接之主義，求約束國民心理於一途」來樹立自己一派勢力^⑦。1910年，梁辦《國風報》，以言論節制為方針，蓋「近儒之研究群眾心理學者，謂其所積之分量愈大，則其熱狂之度愈增，……而當其熱度最高之際，則其所演之幻象噩夢，往往出於提倡者意計之外，甚或與之相反，此輿論之病徵也……」^⑧。

呂邦認為「群眾行為之大部分而論，其心意程度之低下，誠不待論」，而且群眾心理是「古代遺音之所寄」，換而言之，乃朝種族進化早期階段逆退之返祖現象^⑨。呂邦的著作常用法國大革命的「暴民政治」來印證群眾心理之原始。至世紀末，全民普選在西歐各國趨於制度化，呂邦學說亦多少反映精英階層對群眾政治之恐懼。

「群眾心理」與「暴民政治」很快就變成民國政治成語。1913年底，袁世凱解散國會前夕，指責「主張共和之人，托共和政治之名，行暴民政治之實」^⑩。梁啟超並不贊成袁解散國會，但在國民黨「二次革命」期間，卻曾在他的《庸言》上悲嘆「革命成為一種美德，名譽歸之，及既成功，而群眾心理所趨，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，躁進之徒，以此自階，……此種謬見深中於人心，則以極危險之革命，認為日用飲食之事」^⑪。

1914年，國民黨的胡漢民替「被一般政客極端排斥以為吾國政治之惡現象」之「暴民政治」辯護。彼等認為「暴民政治」為「強有力之政府所不容」。胡認為「政府」必須以「集合心理自規律其行動」，否則乃藐視民意。他針對「《庸言報》某氏」之「奇謬之談」，揭露進步黨的中央集權論乃替袁世凱的野心服務，可惜「論者心目中之人物，猶視拿破崙第三遠遜，而其野心與其暴行，則頗彷彿焉」^⑫。

野心家和政客們貶抑群眾心理，或別有用心。真正堅信群眾心理乃退化而永不超生者，反而是啟蒙思想家。魯迅在1918年提倡「個人的自大」，反對中國人向來的「合群的愛國的自大」，說中國人以為憑「數目極多，只需用mob的長技，一陣亂噪，便可制勝」。他又從群眾心理學談到呂邦的國民心理學：「法國G. Le Bon著《民族進化的心理》中，說……『我們一舉一動，雖似自主，其實

魯迅在1918年提倡「個人的自大」，反對中國人向來的「合群的愛國的自大」，陳獨秀亦有同感。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遊行示威事件，陳雖然積極支持，但仍於6月8日寫作〈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？〉，作出警惕。

多受死鬼的牽制。將我們一代的人，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，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。」^⑤呂邦此說在當時很流行。高語罕亦認為國民劣根性「又何一非吾祖宗相傳之心理耶？」^⑥（五四時代思想界流行易卜生的《群鬼》，用父傳梅毒意象來比喻傳統思想之毒害，喜為魯迅、胡適等人引用。）

陳獨秀對魯迅針砭「合群的愛國的自大」亦有同感。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遊行示威事件，陳雖然積極支持，但仍於6月8日寫作〈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？〉，作出警惕：「愛國大部分是感情的產物，理性不過佔一小部分，有時竟全然不合理性，……當社會上人人感情熱烈的時候，他們自以為天經地義的盲動，往往失了理性，做出自己不能認識的罪惡。……這是因為群眾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礎，所以群眾的盲動，有時為善，有時也可為惡。」^⑦

「五四運動」可以說是現代群眾政治在中國首次登場。該運動常被史家和「新文化運動」混為一談。但如用對「群眾心理」的態度為石蕊試紙，則可試出兩者簡直乃酸鹼之別。「新文化運動」強調群眾的落後，支持「五四運動」者則正面肯定群眾心理。五四事件的同年8月，胡漢民指出呂邦思想在中國被扭曲：「這次北京上海以及各地起的愛國風潮，也有人說『這不過是一種無意識的群眾心理的舉動』，……然而呂邦並不輕視群眾心理，……與我國官僚的見解，大不相同，他說：『群眾就着自己不甚理解的事，奮勇健鬥，視死如歸，斷不能說他是利己心的指導。』」胡氏認為「拿這次愛國風潮來說，在罷課罷市的期間，群眾有那些忍耐、熱誠、犧牲、自制、平和、種種好處，都是民族精神的表現」。呂邦在當時權威性很高，胡氏不得不引用他：「呂邦認現在時代是個群眾時代，他對於二十世紀的趨勢，是看得明瞭的。」但胡氏不以呂邦否定法國大革命為然：「法國這幾十年，共和政體已甚鞏固，這番歐洲大戰，更是發揮他民眾政治的精神，呂邦說〔法國革命〕是無味的招牌，恐怕大多數法國人是不承認的。」胡氏自然是以法蘭西共和國諷中華民國：「我們掛的招牌，同法國一樣，我們店子裏的貨品，就更比法國不如。……呂邦說招牌是個名是沒用的。我的意思不然，有了一個公認的名，就有了是非真偽的標準。……到了洪憲改元，要做他的皇帝，便立腳不住。」^⑧

呂邦在中國被「各取所需」，也由於其思想體系內含有不同話音。呂邦一方面把群眾心理和犯罪心理等同，另一方面又把它和宗教心理等同，於是「群眾心理」同時表現為獸性和無私性。胡氏既肯定群眾心理的無私，認為只需改造群眾「無理性」一面便可，假以時日，他們「感情的信仰」會進化為「知的信仰」。胡的說法已預見戰後出現的「理性群眾說」(the rational crowd)。

五四事件後，中國知識界普遍出現對「群眾心理」的欣快症(euphoria)。有人說「群眾心理有抵抗強烈壓制之能力」，又「為國家生存發達不可缺乏之要素」，因此有「去其缺點而存其優點」之急務^⑨。有人主張「把群眾的心理弄成個好狀態」，蓋「法國學者黎朋以為官僚和政府少不來人民之一種合法的反對」，因此群眾必須養成「抵抗力」云云（呂邦可沒這麼說）^⑩。《新青年》上一位作家則替「烏合之眾」和「群眾心理」辯護^⑪。患欣快症最顯著者，莫如《晨報》派駐莫斯科通訊員瞿秋白——他用佛學唯識宗的構思，把十月革命當作是宇宙「心海」最近湧現的一股海嘯巨浪，而莫斯科則處於它的「濤巔」。瞿把「社會心理」和

「五四運動」常被史家和「新文化運動」混為一談。但如用對「群眾心理」的態度為石蕊試紙，則可試出兩者簡直乃酸鹼之別。「新文化運動」強調群眾的落後，支持「五四運動」者則正面肯定群眾心理。

「群眾心理」兩詞互用，宣稱「社會革命怒潮中的赤都只是俄勞動者社會心理的結晶」^⑥。同時，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亦引用呂邦，說「革命是群眾心理的結果」^⑦。

在瞿秋白和朱謙之都呈現群眾心理欣快症狀時，瞿的同志陳獨秀則正在與朱的同志區聲白展開「群眾心理」論戰。陳在當時已經是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之總書記，與無政府主義爭奪青年群眾。區全面肯定「群眾心理」，陳則站在列寧式革命精英主義立場上，指責區想用「盲目的群眾心理……造成一個可恐怖的社會」^⑧。陳其實骨子裏仍是啟蒙者高高在上姿勢。當時抱同樣姿勢的還有少年中國學會的余家菊，說革命時代是「發揮獸性光大野性的好機會」，因為「群眾的心理」必然退化成為「非理性的」^⑨。陳和余無疑更接近呂邦的原意，但法國革命史學者魯德(George Rude)指出：呂邦從未曾真正研究過歷史性群眾，他的方法是搞「以論代史」^⑩。

八 中國「反革命」如何活學活用法國革命的教訓

進入20年代，國共兩黨勢力都大獲發展，它們先搞統一戰線，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，而後由合作演變到分裂，國民黨血腥清黨，中共鬧暴動，政治和社會衝突都有步步上升之勢。此時，呂邦的社會心理學又扮演了另一種角色，它從啟蒙者的意念工具變成政治社會鬥爭的思想武器。我們已經領教了呂邦的國民心理學和群眾心理學，看到它們如何在建國時期和五四時期影響了中國人的敘事。呂邦的另一門學說——革命心理學——則和蔣介石1926年3月20日的廣州政變(俗稱「中山艦事件」)之觸發有關。

孫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後，蔣介石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一顆新星。孫總理在生命最後階段已採聯俄聯共政策，並派蔣赴莫斯科考察，籌建黃埔軍校。總理死後兩個月，就爆發「五卅」反帝高潮，造成中國社會意識的激進化，把國民黨推向左，黨內外的共產黨勢力亦大大膨脹，而這股趨勢又與誰繼承總理的問題糾結在一起。在蘇聯顧問和黨內共產黨人把持下，繼承鬥爭變成打擊黨內右派。至8月，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刺，清算右派的步伐馬上加快，胡漢民和許崇智相繼倒台，被逐離廣州。此時，身為黨軍組織人的蔣介石樂於充任左派的打手，立即被提入中央領導圈子。

但去掉了廖、胡、許的中央只剩下汪精衛和蔣介石兩人。蔣一方面是坐了直升飛機，另一方面他的處境實在不值得羨慕，蓋其地位充分暴露，有如箭垛。蔣在黨內之權力基礎是黃埔的黨軍。汪在黨內無權力基礎，不得不盡量迎合共產黨人，拉攏他們當自己的權力基礎。反右的動量無疑仍持續，那末，中央只剩下了兩個人，下一個被開刀的「右派」會是誰？——這是蔣不得不想的問題。

1926年1月國民黨舉行「二大」，乃左派的勝利大會。黨內被鎮壓的右派勢必要找一個代言人，蔣是當然人選。他們對蔣進行挑唆，而黨內共產黨人亦有攻擊蔣是「新軍閥」者。蔣的世界觀遂轉變：先前他有份參加並從中獲利的「反

五四事件後，中國知識界普遍出現對「群眾心理」的欣快症。最顯著者，莫如瞿秋白和朱謙之。瞿的同志陳獨秀則站在列寧式革命精英主義立場上，指責「盲目的群眾心理……造成一個可恐怖的社會」。

右」，如今被他重新定義為「共黨篡黨陰謀」。在這段期間內，法國大革命的一些教訓也在他腦海中猛然活了起來。根據蔣的日記，他在「三二〇」前夕在閱讀一本《革命心理》，並受其影響。該書毫無疑問乃杜師業翻譯呂邦的《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》^①。

蔣在3月份記下：「三日看革命心理一書，至晚已九十八頁，乃曰：『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，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。』……四日，儘日在校看革命心理下卷，因嘆法國革命甲古班黨〔指the Jacobins，山岳黨為其極左派，兩者常被當做同義詞〕以其信仰之強固嫉妒與殘暴專橫造成勢力，故不可持耳。」杜譯本在九十八頁以前確實談到「神秘之心理狀態與甲古班黨之心理狀態」。3月5日條下則顯示蔣震懾於「革命心理」，並思以迎合之：「看革命心理終卷曰：『恐怖與憎惡二者，乃為暴動之動力，感情與神秘之勢力在革命心理學中佔一重要地位，而宗教式的信仰，亦為革命心理唯一之要素耳。順應時勢迎合眾心，為革命領袖唯一之要件，吾何能之。』」但這個念頭馬上為被害妄想所蓋過：「單槍匹馬前狼後虎，孤孽顛危，此吾今日之處境也。」^②

蔣介石在呂邦的著作中，找到打擊對手的理論根據。



「三二〇」政變後，蔣在4月20日的一次黃埔晚宴上，在「晚宴退出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」後，向出席者交代政變原委，用下列比喻：

這是差不多是和法國大革命經過的一段情形相同的。……拿不革命的話來加我反革命的罪惡，你想可痛不可痛呢。從前法國大革命的時候，要推倒一個領袖，誣害一個領袖，沒有事實可證，就拿一句不自由不平等的話，來加他領袖的罪惡，利用一般失卻理性的群眾，來推翻他的領袖。現在這回幾乎也拿反革命不革命的話，來加我的罪名，使得我不能革命，簡直不許我革命。

蔣的日記5月9日條下則顯示他「下午看法國革命史」^③。這段期間，蔣心目中形成的「法國大革命」意象，可能是山岳黨把國王、貴族、教士、紀朗德黨都送上斷頭台後，還繼續「反右」，直到把山岳黨人也送上斷頭台。蔣擔心汪精衛是「羅伯士庇」，利用暴民，把變成「旦東」的他送上斷頭台。

九 尾 聲

在北伐期間，認為中共搞農民暴動過火者，繼續訴諸「群眾心理往往不受理性制裁」命題^④。蔣介石終於在1927年4月開始清黨，中共遭受沉重打擊。一部分左翼知識分子從革命前線撤退下來，匯聚在上海國際租界，用文化攻勢開闢新戰線，導致「革命文學」的誕生。梁實秋和「革命文學」打對台，不可避免地又以暴民心理立論：「現今所謂的演說，尤其是煽動罷工的領袖的演說，一個人全部的為感情所支配，講者叫囂暴躁，聽者為之摩拳擦掌，結果往往是一個暴動。」^⑤梁可能並不覺察這種論說的源頭是呂邦，足以顯示這種論說被大家當做定理般流傳。

在另一方面，「革命文學」則由肯定法國大革命，進而把群眾政治正面化。1927年11月，共產黨作家蔣光慈發表小說，描寫北伐期間上海工人三次起義，名曰《短褲黨》。該名乃「無短袴黨」(the Sans-culottes)的誤譯，指恐怖時代巴黎的革命群眾。把歷史當做諷喻，蔣光慈之原意是想藉法國先例來賦予中國時事以歷史光環。但他不知不覺間卻用中國工人的英雄行動把法國先例的形象正面化。鑒於「恐怖時代」歷來在中國的形象不佳，這種肯定實在十分需要、十分合時。顯然，中、法兩個革命的對話不限於前者單方面聆聽後者，後者亦必須憑藉前者才撐得起來。

蔣光慈之運用法國大革命諷喻，已擺脫呂邦式集體心理學窠臼，而明顯地進入「階級鬥爭」思考方式。在中國，被法國第三共和時期媒介化的「法國大革命」意象，和集體心理學同一命運——兩者的影響皆止於20年代後期^⑥。從該時始，中國革命轉用俄國革命的意象成語包裝。這種包裝似乎更不合身。俄國三月(舊曆二月)革命後出現臨時政府與蘇維埃，兩者並存首都市內，只是兩個街坊之隔，是謂前革命狀態的「雙重政權」。後來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內奪權，

在中國，被法國第三共和時期媒介化的「法國大革命」意象，和集體心理學的影響皆止於20年代後期。從該時始，中國革命轉用俄國革命的意象成語包裝。

在20年代末以前，大家關心的都是建國和如何形成國民共同心理基礎的任務，階級鬥爭理論沒有甚麼吸引力，這種理論在俄國革命成功前也不具說服力。當時的社會科學流行用心理學解釋社會，與後來的唯物史觀完全反其道而行，真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。

利用它的名義在十一月(舊曆十月)間推翻臨時政府，結束前革命狀態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。中共則把在農村裏割據也當作「雙重政權」，把農村根據地稱作「蘇維埃」，但蘇區內非但沒有廢除私有制，反而進行了分田。中共把自己當做「布爾什維克」，把托陳派當做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後出現的「取消派」之中國化身，又把俄國革命史上赤軍白軍內戰的一頁重寫為中國革命史，稱自己割據的武裝力量做「紅軍」，把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叫做「白軍」。但到抗戰爆發時，中共自己也把這類擬之不倫的名稱作廢。

在今日，雖然以俄為師時代早已過去，但對辛亥革命與民初歷史的瞭解，仍透過在20年代末才形成的意義符號層次，而無視被埋在這個岩層底下，更接近當時情況的另一個歷史性意義岩層。在20年代末以前，中國人運用社會心理學框框和法國大革命意象成語，其廣泛程度並不遜於後起的馬列主義階級分析和俄國革命掌故。一來，當時中國從皇朝轉變成國家，大家關心的都是建國和如何形成國民共同心理基礎的任務，把國家和社會搞分裂的階級鬥爭理論不會有甚麼吸引力，這種理論在俄國革命成功前也不具說服力。而且，在俄國革命變成另一個模範之前，世界各地現代式革命和共和國之締造，總脫不了法國這個模範——甚至連俄國革命亦不例外^⑦。此外，當時的社會科學流行用心理學解釋社會，與後來在中國代之而興的唯物史觀完全反其道而行，真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。本文的目的就是對這個被掩埋了的歷史意義岩層進行考古發掘。

註釋

③③ 〈論官僚主義〉(1913.9.1)，《李大釗文集》上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4)，頁51。說美國政治裏「官由民選之害」，似乎指當時「城市政閥」(the city bosses)和「分贓政治」(pork-barrel politics)等弊端。

③④ 張靜如等編：《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》(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1984)，頁9。

③⑤ 文章裏有內證，非本文範圍所能論及。此文《李大釗遺文補篇》(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)沒有收入。

③⑥ 〈暗殺與群德〉，《李大釗文集》上，頁23。

③⑦ 〈原殺(暗殺與自殺)〉，《李大釗文集》上，頁46-47。

③⑧ 〈風俗〉(1914.8.10)，《李大釗文集》上，頁92。

③⑨ 〈政治對抗力之養成〉，《李大釗文集》上，頁106-108。

④⑩ 河村望：《日本社會學史研究》上(東京：人間の科學社，1973)，頁320。

④⑪ 〈通信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2卷，第6期(1917.2.1)，頁8-9。

④⑫ 〈時局雜感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3卷，第4期(1917.6.1)，頁1-3。

④⑬ 〈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〔之二〕〉，《青年雜誌》，第1卷，第2期(1915.10.15)，頁1。

④⑭ 〈民約與邦本〉，《青年雜誌》，第1卷，第3期(1915.11.15)，頁1。

④⑮ 〈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〔之三〕〉，《青年雜誌》，第1卷，第3期(1915.11.15)，頁5。

④⑯ 〈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2卷，第5期(1917.1.1)，頁1。

④⑰ 〈抵抗力〉，《青年雜誌》，第1卷，第3期(1915.11.15)，頁2、4。

- ④⑥ 〈復辟與尊孔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3卷，第6期(1917.8.1)，頁4。
- ④⑨ 《新青年》，第2卷，第4期(1916.12.1)，頁1-2。
- ⑤⑩ 張允侯等編：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)，第1冊，頁383。
- ⑤⑪ 《青年雜誌》，第1卷，第1期(1915.9.15)，頁1-3。
- ⑤⑫ Le Bon: *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*, translator unknown (published by New York: G.E. Stechert & Co., 1924; reprinted by New York: Arno Press, 1974), p. xiv.
- ⑤⑬ 丁文江、趙豐田編：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)，頁397。
- ⑤⑭ 〈國風報敘例〉(1910.2.20)，《合集》，第3冊，《文集》之二十五(上)，頁20。
- ⑤⑮ 黎朋(呂邦)著，吳旭初、杜師業譯：《群眾心理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0)，頁6-7。
- ⑤⑯ 《袁世凱傳》，頁271。
- ⑤⑰ 〈革命相續之原理〉，頁52。
- ⑤⑱ 〈強有力之政府辯〉(1914.6)，《胡漢民先生文集》(台北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，1978)，第2冊，頁77、78、80。
- ⑤⑲ 〈隨感錄三十八〉，《魯迅全集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)，第1卷，頁311、313。
- ⑥⑰ 〈青年之敵〉，《青年雜誌》，第1卷，第6期(1916.2.15)，頁3。
- ⑥⑱ 《獨秀文存》(九龍：遠東圖書公司，1965)，卷1，頁647-648。
- ⑥⑲ 漢民：〈呂邦的群眾心理〉，《建設》，第1卷，第1號(1919.8)，頁77-101。
- ⑥⑳ 徐彬彬：〈個人心理與群眾心理〉，《新中國》，第1卷，第3號(1919.7)，頁24、27。
- ⑥㉑ 吳載盛：〈救國問題的根本解決〉，《新中國》，第2卷，第1號(1920.1)，頁104、106。
- ⑥㉒ 嚴智鍾：〈數要多，質要好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7卷，第4號(1920.4.1)，頁1。
- ⑥㉓ 〈餓鄉紀程〉，收入《瞿秋白文集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5)，第1卷，頁99。
- ⑥㉔ 《革命哲學》(上海：泰東圖書局，1921)，頁119。
- ⑥㉕ 〈討論無政府主義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9卷，第4期(1921.8.1)，頁6。
- ⑥㉖ 〈甚麼是革命的最好方法？〉，《少年中國》，第2卷，第2期(1920.7.15)，頁37。
- ⑦⑰ George F.E. Rude: *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* (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959), pp. 111, 219.
- ⑦⑱ 黎朋原著，杜師業重譯，吳福同增訂：《革命心理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18)，上下冊。
- ⑦⑲ 毛思誠編：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1936年初版(香港：龍門書店，1965)，頁622-623；653-654、664。
- ⑦㉑ 楊恥之：〈農民運動與暴動(湖南來文)〉，《生活》，第2卷，第13期(1927.1.30)，頁83。
- ⑦㉒ 〈文學的紀律〉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：《「革命文學」論爭資料選編》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)，頁1051。
- ⑦㉓ 這是總的來說。群眾無理性的說法可能仍流傳至今。「七七事變」前後，西北軍的張自忠當北平市長，奉令和日方周旋，被國人視為漢奸，後逃歸南京。李宗仁安慰說：「群眾是沒有理智的，他們不知道底蘊才罵你，你應該原諒他們動機是純潔的……」，《李宗仁回憶錄》下(廣西南寧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，1980)，頁724。這個表面像常識的說法其實背後有學理根據，而群眾心理學獲得最理論化地位的時代，是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20年代。
- ⑦㉔ 後來托洛茨基還把斯大林當權比作「熱月政變」。